

遵义会议前后

丁芝珍 陈德诤 何长凤
沈德海 顾隆刚 黄自为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继泽
封面设计 谢元庆

遵义会议前后

丁芝珍 陈德谔 何长风
沈德海 顾隆刚 黄自为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97千字 2插图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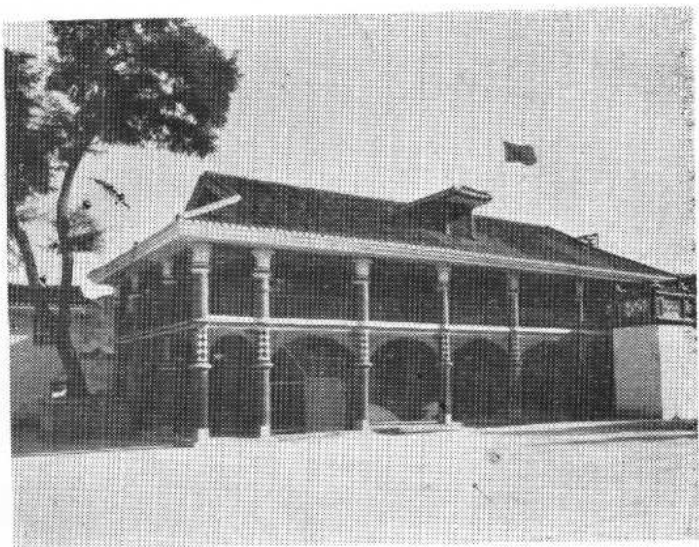
印数1--6,000

书号: 11115·74 定价0.54元

遵义会议会址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写的匾额

遵义会议会址



娄山关



前 言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之际，为了记述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所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们编写了本书，并以此作为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英勇奋斗的红军的纪念。

全书共分七章。记述了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会师这一时期党和红军的斗争史实，其中以遵义会议和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作为重点；同时也介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文献失征、稽考为难，不敢谓尽得史实首委；只是力求发以往所未见，补旧史之不给。

本书采用了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和革命前辈所写的回忆录中的一些资料，利用了有关单位的文献档案，恕不一一胪列，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由（按姓氏笔划排列）丁芝珍、陈德湜、何长风、沈德海、顾隆刚、黄自为编写，集体定稿。

由于水平所限，谬误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六月

目 录

一、被迫长征·····	(1)
(一)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1)
(二)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4)
(三) 被迫长征, 湘江失利·····	(9)
二、通道转兵·····	(15)
(一) 具有革命传统的贵州人民·····	(15)
(二) 红军播下革命火种·····	(20)
(三) 军阀割据、兵力空虚·····	(31)
(四) 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34)
三、挺进黔北·····	(38)
(一) 转战苗岭, 进逼乌江·····	(38)
(二) “红军红军, 苗家救星”·····	(41)
(三) 强渡乌江天险·····	(47)
(四) 遵义人民迎红军·····	(57)
(五) 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	(67)
四、伟大的历史转折·····	(72)
(一)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72)
(二) 力挽狂澜的遵义会议·····	(77)
(三) 功绩垂青史, 光辉照前程·····	(86)
五、遵义的曙光·····	(93)
(一) 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	(93)

(二)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97)
(三) 打倒土豪，武装民众·····	(104)
(四) 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	(111)
六、四渡赤水·····	(116)
(一) 北渡赤水，挺进川南·····	(116)
(二) 回师东进，再占遵义·····	(120)
(三) 再入川南，吸引群敌·····	(125)
(四) 威逼贵阳，调出滇军·····	(127)
(五) 乘虚西进，巧渡金沙·····	(131)
七、胜利进军，会师陕北·····	(134)

一、被迫长征

(一)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一九二七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在全国许多地方点燃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烈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其他各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取得了巨大的战绩。此时，全国红军发展到十万余人，革命根据地遍布全国十多个省的广大地区。

当中国革命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时候，一九三一年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蒋介石政府采取对外屈膝、对内加紧“剿共”和镇压革命势力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和阶级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怒潮，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政治上的分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

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一九三二年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反日运动的影响下，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以上说明，革命的主观力量得到了发展，客观形势也对革命极为有利的。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党不仅丧失了发展革命形势的有利时机，而且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挂着执行“国际路线”的招牌，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比前两次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更有“理论”、气焰更盛，推行了对革命危害更大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等人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上，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求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在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现阶段中国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意义，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起来，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轻视并否定农村革命根据地，要求红军离开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夺取中心城市；在白区工作的方针上，反对利用合法形式和积蓄革命力量，而实行脱离多数群众的冒险政策。他们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用那些拥护他们“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所谓“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而对抵制他们错误的干部，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破

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削弱了党的组织。他们忽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将要一致进攻苏联，强调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将要一致进攻中国革命，并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主张“打倒一切”，但不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就使党不能有效地领导和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的损失。王明等人在白区，盲目地开展政治罢工、罢课、罢市，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以至武装暴动，使党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都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最后，在一九三三年初，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统治的临时中央，也不得不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使“左”倾错误得以进一步贯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去。早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上，“左”倾的领导人便开始排斥毛泽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后，他们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一九三三年五月，他们又发动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了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

从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党和红军进行了反对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的斗争。虽然这时毛泽东已被排斥出红军的领导，但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

德等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的战略，灵活地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围歼敌人，仍然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而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则由于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能够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分别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和十月撤出了这两块根据地。

（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蒋介石政府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的步伐。继侵占东北之后，日军又把魔掌伸向华北。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山海关。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的条件之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共同抗日。可是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安危于不顾，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坚持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内战的反动政策。蒋介石竟然下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日本的侵略，“侈言抗日者杀无赦”。五月，蒋介石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准备了条件。与此同时，蒋介石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围剿”大造反革命舆论。四月，蒋介石胡说什么：“国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是江西的土匪。”五月，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庐山开会后，联名发出通电，叫嚷：“救国必先剿共”，决定倾尽全力“剿共”，

九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纠集了一百万军队、

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并以五十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鉴于以往几次的失败，蒋介石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采取了“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新战略；并制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数十万兵力的军事围攻，妄图实现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的罪恶目的。蒋介石军队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其所属部队在战前已集结于南昌、抚州、南城、南丰、永丰、吉水等地，准备由北向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其所属部队战前已集结于安福、泰和、峡江、吉安、遂川、莲花、万安、宜春等地；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其所属部队战前已集结于安远、寻鄔、武平、上杭、信丰等地；此外，东路有十九路军蔡廷锴部，驻扎在漳平、延平、顺昌、将乐、邵武等地。这四路军队，以北路军为“剿共”主力，西路军、南路军和在东面的十九路军，则担负封锁和防堵任务。

由于敌人发动新的大规模“围剿”，红军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局势，但仍然有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这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赤卫队近二十万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已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三百万人口，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政权巩固，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高涨；红军有了几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广大军民同仇敌忾，具有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继续妥协卖国

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抗日反蒋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抗日和妥协两派之间的分裂与斗争。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与共产党人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上述的一切，都是有利于红军反“围剿”斗争而有利于蒋介石的进攻的；红军是有可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的。可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遭到了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否定了毛泽东的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战略战术，而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战略方针和其他错误政策；特别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信任和重用完全不懂红军作战原则的军事顾问李德。博古对李德言听计从，把军事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而李德自恃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专横跋扈，独断独行。“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和李德等，不了解中国社会和红军的实际，不承认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他们否认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因而也就否定了过去红军用来战胜敌人的一整套战略战术，把毛泽东等制定的游击战、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以及“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称之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他们要求处于劣势的红军同强大的敌人作正规战、阵地战，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提出“不丢失一寸土地，与阵地同存亡”的错误口号。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左”倾领导人和李德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北线敌人第八纵队为了切断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革命根据

地的联系，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北的黎川。博古、李德等认为黎川失守，等于是被敌人打开了根据地北面的门户，十分震惊，于是命令在闽西作战的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迅速回师赣东北，欲将黎川收复。十月七日，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打了一场遭遇战，歼灭了敌第八纵队第六师的第十八旅，生擒了旅长葛钟山，红五军团也给前来增援的敌人以一定杀伤。洵口初战胜利，“左”倾领导人就以此为根据，更急于收复黎川。十月九日至十三日，命令红三、五、七军团攻打黎川以北位于白区的敌之巩固阵地硝石，不胜。接着，十月二十四日又命令红五军团攻打白区敌人的另一个巩固阵地资溪桥，又不胜。此后，红军在临川、金溪、黎川地区堡垒之间转战，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不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被蒋介石调至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由于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在蔡廷锴、蒋光鼐等领导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琛等部分反蒋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这就是“福建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害怕红军和十九路军的联合，决定先“救平闽变”，再“围剿”红军，将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北路军的部分部队东调，前往镇压十九路军，从而造成红军打破敌人“围剿”的极好时机。这时，毛泽东根据上述有利形势，主张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挺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借以迫敌回援江浙。

实现这一主张，红军就可粉碎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并能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左”倾领导人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他们不仅完全抹煞“福建事变”抗日反蒋的积极意义，还错误地认为，发动“福建事变”的中间派的反蒋抗日，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①李德甚至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他们拒绝给十九路军以积极的援助和配合，致使蒋介石的部分北线部队得以畅行无阻地南下去进攻福建人民政府。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失败了。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之后，即集中全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三月，他命令蒋鼎文率领部署在闽西的东路军进攻闽赣边界的红军。由于“左”倾领导人实行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泰宁、永安、建宁相继失陷。其后，四月中旬，蒋介石又命令陈诚指挥北线敌人十一个师由甘竹向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进攻。这时“左”倾领导人继续实行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拒绝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的不能固守广昌的意见，调集一、三、五、九军团，组织广昌大会战。在作战中，分散兵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强令红军在敌人堡垒面前构筑工事，实行“短促突击”^②，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在广昌保卫战期间，红军曾

^① 见《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② “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的战术原则。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我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我军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

进行英勇的抗击，但因“左”倾领导人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四月底，广昌终于失守。

继广昌战役之后，六月，敌人分兵六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古龙岗、石城等地进攻。这时，“左”倾领导人仍然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的战法，并且违背集中兵力的原则，用“六路分兵”来对付敌人的“六路进攻”，命令红军在兴国的高兴圩、古龙岗，广昌的头陂、高虎脑等地布防。在广昌南部的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战斗中，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密集的队形，反复对我军阵地冲锋。我军英勇无畏，坚定沉着，与敌人激战，杀伤不少敌人。但由于实行节节抗击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我军也遭到重大损失，根据地越来越小。九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进行一年之久，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退守，兵少而地日蹙，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已受到敌人的威胁，情况万分紧急。这时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红军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当时湖南中部一带敌人兵力比较空虚，而且还没有建成堡垒封锁线，红军进入湘中，江西敌人必然回援。这一主张是有利于红军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以扭转战局的。但是“左”倾领导人却顽固地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三）被迫长征，湘江失利

在石城、古龙岗、兴国一线失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